

收入不平等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抑制效应与扩容路径

——基于需求分层、预防性储蓄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分析

杨峯巍

学号：2025020718

摘要：当前我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但最终消费率和消费倾向仍面临修复压力，收入分配结构成为解释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切入点。本文以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为主题，在借鉴 QUAIDS 消费需求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边际消费倾向异质性、相对收入效应和预防性储蓄机制，构建收入不平等影响消费规模与消费结构的分析框架。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主要通过三条渠道抑制消费需求：一是收入向高收入群体集中导致社会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二是低收入家庭面临更强的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冲击，形成被动储蓄与消费降级；三是相对收入差距改变家庭支出排序，使教育、住房和耐用品消费中的追赶性支出挤出一般服务消费。进一步看，收入不平等对食品、衣着等基本消费的影响较弱，对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和发展型服务消费的结构影响更明显。扩大内需不能仅依靠短期补贴，还需要以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完善再分配制度、降低家庭风险支出和扩展公共服务供给为政策组合，以共同富裕目标稳定居民预期、释放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潜力。

关键词：共同富裕；收入不平等；消费需求；消费结构；边际消费倾向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从宏观运行看，居民消费既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收入分配格局的集中反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1314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1%；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8227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3%。收入和消费同步增长说明居民生活水平继续改善，但从长期结构看，居民消费率仍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经济体，服务消费和发展型消费的扩张也受到收入预期、风险保障和财富分化的共同制约。

收入不平等为什么会影响消费需求，是理解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关系的关键问题。传统凯恩斯消费函数强调收入水平决定消费，但当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存在显著异质性时，收入分配本身就会影响总消费。若新增收入更多流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家庭，社会总消费会弱于收入总量扩张；若低收入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即使有

强烈消费需求，也难以转化为有效购买力。与此同时，中国家庭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承担较高风险支出，收入差距扩大还会强化预防性储蓄和相对地位竞争，使消费结构偏离生活品质改善和服务消费升级的方向。

既有研究已经从宏观消费率、家庭消费结构和需求系统估计等角度讨论收入分配与消费的关系。朱国林等较早指出，收入分配恶化会削弱居民消费需求，是解释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 [1]。楼锋、李雪松从中国总消费率下降事实出发，强调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对消费倾向的影响 [2]。以 QUAIDS 模型为代表的微观需求系统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收入阶层、地区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消费结构弹性存在显著差异 [9, 4, 5]。这些研究共同提示，收入不平等不只是公平问题，也会通过需求侧渠道影响经济循环。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预期效应，避免仅用消费率变化概括复杂机制；第二，在 QUAIDS 模型思想基础上引入需求分层，讨论不同消费类别受收入差距影响的方向差异；第三，将共同富裕目标与扩大内需政策联系起来，说明收入分配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和风险保障如何共同构成消费扩容的制度条件。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

关于收入分配影响消费的理论脉络，可以追溯到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命题。若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家庭，收入向高收入群体集中会降低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后续研究在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和流动性约束框架下进一步指出，家庭消费并非只由当期收入决定，还取决于财富、借贷约束和风险预期。Carroll 等基于财富分布估算发现，财富集中度越高，新增财富转化为消费的比例越低 [13]；Jappelli 和 Pistaferri 的研究也表明，财政转移的消费效应取决于家庭流动性约束和边际消费倾向异质性 [12]。

中国情境下，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具有更强制度背景。一方面，城乡、区域和行业间收入差距使消费能力分布不均；另一方面，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负担提高了家庭不确定性。陈建宝、李坤明从收入分配与人口结构角度解释消费结构变化 [3]，唐琦等利用城镇居民家庭数据分析消费结构，发现收入阶层差异会显著改变消费支出份额 [5]。这些结果说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不仅具有再分配意义，也能直接改善消费需求结构。

（二）需求系统与消费结构

在消费结构研究中，AIDS 和 QUAIDS 模型被广泛用于估计不同消费品类预算份额、价格弹性与收入弹性。Deaton 和 Muellbauer 提出的 AIDS 模型通过可加性、齐次

性和对称性约束刻画家庭需求结构 [8]; Banks、Blundell 和 Lewbel 进一步提出 QUAIDS 模型, 在 Engel 曲线中加入二次项, 从而更好描述消费份额随收入变化出现的非线性特征 [9]。对中国家庭而言, 基本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收入弹性差异较大, QUAIDS 模型能够捕捉收入提高后食品占比下降、教育文化和服务消费占比上升等结构变化。

收入不平等进入需求系统, 通常体现为家庭收入位置、群体相对收入或地区收入差距对预算份额的影响。胡日东等基于 LA/AIDS 扩展模型发现, 城乡收入差距会改变居民消费结构 [4]; 王俏、聂力用非参数面板方法刻画消费行为差异, 说明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收入门槛 [6]。因此, 分析收入不平等不能停留在总消费层面, 还应讨论不同品类需求如何被收入差距重新排序。

(三) 共同富裕、风险保障与消费预期

共同富裕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目标与消费扩容存在内在一致性。第一,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能够提高稳定消费主体的比重; 第二, 再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能够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 第三, 公共教育、医疗和住房保障能够减少发展型支出的刚性压力, 使家庭有能力增加服务消费和品质消费。Bilbiie 等关于收入风险和资产定价的研究表明, 收入风险上升会改变家庭消费和储蓄选择 [14]。在中国, 风险支出更容易集中在教育、医疗和住房领域, 因而公共服务改革会通过预期渠道释放消费需求。

三、作用机制与分析框架

(一) 收入集中与边际消费倾向效应

设社会由 n 个家庭组成, 第 i 个家庭收入为 y_i , 消费函数为 $c_i = c(y_i, w_i, z_i)$, 其中 w_i 为财富, z_i 为家庭人口、地区和风险保障等特征。社会总消费为:

$$C = \sum_{i=1}^n c_i, \quad \frac{\partial C}{\partial Y} = \sum_{i=1}^n s_i \cdot mpc_i, \quad (1)$$

其中 s_i 表示新增收入流向家庭 i 的份额, mpc_i 为边际消费倾向。当 mpc_i 随收入和财富上升而下降时, 收入分配越向高收入家庭集中, 社会平均边际消费倾向越低。由此可见, 收入不平等会通过收入流向结构直接压低总消费扩张弹性。

这一机制在政策上意味着, 刺激消费不能只看居民部门收入总量, 还要看收入增量的分配位置。若工资性收入增长不足, 或财产性收入和资本收益主要集中于高财富家庭, 则消费扩容效果有限; 若就业质量改善、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和转移支付精准覆盖同步推进, 消费需求会获得更强支撑。

（二）流动性约束与预防性储蓄效应

收入不平等还会放大低收入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中低收入家庭通常财富缓冲薄、信贷可得性弱，面对失业、疾病、教育和养老风险时更倾向于保持高储蓄。即便其潜在消费需求较强，也会因不确定性而推迟耐用品消费、减少服务消费，或选择低价格、低品质替代品。预防性储蓄并非单纯由节俭偏好引起，而是家庭风险自保的结果。

从消费结构看，流动性约束对不同消费类别的抑制并不相同。食品和基本居住支出具有较强刚性，下降空间有限；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医疗保健和家庭设备等支出则更容易受收入预期和信贷约束影响。若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家庭还可能将有限收入更多配置到教育和医疗等风险应对领域，减少文娱、养老服务、家政服务和休闲消费。

（三）相对收入与追赶性支出效应

收入不平等改变的不仅是绝对购买力，也包括家庭对社会地位和未来机会的判断。相对收入差距扩大时，家庭可能为了教育竞争、住房区位和婚育匹配增加追赶性支出。这类支出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提高了教育、住房及相关耐用品支出的预算占比；另一方面，它会挤出日常服务消费和即时享受型消费，降低消费福利。尤其对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家庭而言，追赶性支出常常伴随负债或压缩其他消费，容易形成“有支出、低福利”的结构矛盾。

因此，收入不平等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不能简单理解为“少消费”。更准确地说，它会造成消费能力不足、消费预期不稳和消费结构扭曲并存：基本消费被动稳定，发展型消费压力前置，享受型和服务型消费扩张不足。

表 1 收入不平等影响消费需求的主要渠道

作用渠道	机制说明	主要影响方向
边际消费倾向	收入增量更多流向高收入家庭，社会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抑制总消费扩张
流动性约束	低收入家庭信贷可得性弱，收入波动时被迫压缩消费	抑制耐用品与服务消费
预防性储蓄	医疗、教育、养老等风险支出提高家庭自保储蓄	降低消费倾向
相对收入竞争	家庭为教育、住房和地位竞争增加追赶性支出	扭曲消费结构
公共服务差异	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使风险支出私人化	加剧区域和阶层差异

四、消费结构效应：基于需求分层的讨论

（一）基本消费：刚性支出与恩格尔效应

食品、衣着和基本居住支出构成家庭生存型消费。收入不平等对这类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质量差异而非数量差异。低收入家庭食品支出占比较高，收入增加会优先改善食品质量和营养结构；高收入家庭食品支出占比低，新增收入更多流向服务、金融资产或教育投资。因此，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时，社会总食品消费的数量增长有限，但食品质量升级和健康消费扩张会受到中低收入家庭购买力不足的制约。

恩格尔效应还意味着，缩小收入差距未必显著提高食品支出占比，却能够改善消费福利。中低收入家庭收入提高后，可能减少低品质替代品消费，增加安全食品、外出就餐和健康服务消费。由此看，消费扩容不是简单追求更多基本消费，而是使家庭从刚性生存支出转向品质改善支出。

（二）发展型消费：教育、医疗与人力资本投资

教育文化和医疗保健支出既是消费，也是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风险管理。收入不平等扩大时，高收入家庭能够稳定增加教育培训、文化娱乐和健康管理支出；低收入家庭则面临预算约束，只能在短期生活支出和长期发展支出之间取舍。这会导致发展型消费机会不平等，并进一步固化收入差距。

教育消费尤其具有相对竞争特征。家庭教育支出的增加并不完全来自生活品质提升，也可能源于升学竞争压力。当收入差距扩大而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均时，中等收入家庭会被迫提高教育支出强度，低收入家庭则可能因支付能力不足而退出竞争。此时总教育支出上升并不必然代表消费福利改善，反而可能意味着家庭机会焦虑加重。

（三）服务消费：升级潜力与预期约束

服务消费是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向，包括文旅、养老、家政、健康管理、数字内容和社区服务等。与实物消费相比，服务消费更依赖稳定收入预期、闲暇时间和制度保障。收入不平等会从两个方面抑制服务消费：一是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不足，难以形成稳定服务消费习惯；二是未来不确定性较高，使家庭倾向于减少可选服务支出。

扩大服务消费的重点不在于单次刺激，而在于建立持续购买能力和放心消费环境。劳动报酬增长、灵活就业保障、养老托育供给、公共文化服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都能降低服务消费的不确定性。共同富裕目标下的消费扩容，实质上是让更多家庭具备稳定进入中高层次消费市场的能力。

五、研究设计、变量构造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处理思路

若将上述理论机制转化为可检验命题，较为合适的数据库是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或国家住户调查微观样本。CFPS 具有家庭收入、消费支出、人口结构、教育、健康、就业和主观预期等多维信息，能够同时刻画家庭消费能力与消费约束；CHFS 在资产、负债、信贷约束和金融参与方面信息更丰富，适合分析财富不平等和流动性约束。本文作为以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为主题的理论和经验框架文章，主要参照 CFPS 类微观数据结构设计研究方案。

样本处理需要遵循三项原则。第一，保证家庭层面的收入和消费口径一致。居民消费需求通常以家庭为基本决策单位，因此应将个人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收入和财产收入汇总为家庭可支配收入，并按照家庭规模或等价成人规模进行调整。第二，对极端值进行稳健处理。微观调查中高收入和高消费样本容易出现极端值，直接使用原始数值可能放大估计偏误，通常可对收入和消费变量进行上下 1% 缩尾处理。第三，区分零消费与缺失值。教育、医疗、耐用品等项目在某一年可能真实为零，不能简单删除；但若因调查漏填造成缺失，则应结合问卷逻辑和家庭其他信息进行判断。

在年度选择上，可采用 2012、2014、2016、2018、2020 和 2022 年等连续或隔年面板样本。这样既能够观察收入分配与消费结构的长期变化，也能避免单一年份冲击造成的偶然性。若样本横跨疫情冲击期，还应设置年份虚拟变量或单独进行样本分段，以区分短期冲击与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影响。

（二）被解释变量：消费规模与消费结构

消费规模可以使用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表示，也可使用消费率，即家庭消费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前者反映消费绝对水平，适合解释消费扩容；后者反映消费倾向，适合考察收入分配对消费意愿和支出能力的综合影响。由于低收入家庭可能存在收入暂时性波动，消费率指标在收入接近零或收入为负的家庭中会出现异常值，实证中应结合对数消费支出和消费率两个指标交叉验证。

消费结构可以按照国家统计局口径划分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用品及服务八类。为贴合本文主题，也可将其合并为三类：基本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基本型消费包括食品、衣着和基本居住支出，具有刚性和必要性；发展型消费包括教育、医疗、交通通信和信息服务，关系到人力资本和社会参与；享受型消费包括文化娱乐、旅游、餐饮服务、家政服务和其他改善型支出，更能体现消费升级水平。

不同消费指标对应的经济含义并不相同。以预算份额为例，某类消费占比上升可能

意味着偏好增强，也可能意味着价格上涨或被迫支出增加。医疗支出占比上升未必代表健康消费升级，可能是疾病冲击；教育支出占比上升也未必代表福利提高，可能是升学竞争压力。因此，在解释消费结构时，需要结合家庭收入位置、风险状态和公共服务可得性判断其福利含义。

（三）核心解释变量：收入不平等测度

收入不平等可以从三个层次测度。第一是宏观或地区层面的收入不平等，常用省级或县级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或收入五等分倍数表示。该指标反映家庭所处地区的整体分配环境，适合讨论相对收入竞争和公共服务差异。第二是家庭相对收入位置，可用家庭收入在本地区同年样本中的分位数、收入排名或相对于地区中位收入的比值表示。该指标更适合捕捉家庭对自身经济地位的主观判断。第三是群体内部差距，例如同村、同社区或同县域收入差距。相比省级指标，社区层面的收入差距更接近日常比较对象，对教育、住房和耐用品消费中的相对竞争影响可能更强。

泰尔指数可以写为：

$$T = \frac{1}{N} \sum_{i=1}^N \frac{y_i}{\bar{y}} \ln \left(\frac{y_i}{\bar{y}} \right), \quad (2)$$

其中 y_i 为家庭等价收入， \bar{y} 为样本平均收入。泰尔指数具有可分解性，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组内差距与组间差距。对于中国而言，城乡、区域和教育水平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重要解释力，因此泰尔分解能够帮助识别收入不平等究竟来自地区发展差距，还是来自同一地区内部的阶层分化。

除客观收入差距外，还可使用主观社会地位和收入满意度作为补充变量。许多家庭消费决策并不只受客观收入影响，也受对未来阶层流动和社会比较的判断影响。如果一个家庭客观收入不低但主观地位评价偏低，可能仍会增加教育和住房等追赶性支出；如果一个家庭收入水平一般但公共服务保障充分、风险预期稳定，其消费倾向未必低。因此，客观不平等与主观不平等的结合能够更完整地解释消费行为。

（四）控制变量与机制变量

控制变量应覆盖家庭人口特征、户主特征、资产负债特征和地区环境。家庭人口特征包括家庭规模、儿童数量、老人数量、抚养比、城镇户籍和婚姻状态；户主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就业身份和行业；资产负债特征包括住房拥有情况、金融资产、经营资产、债务余额和是否存在信贷约束；地区环境包括省份、城乡、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机制变量可围绕三条路径展开。第一，边际消费倾向机制可通过收入分组后的消费倾向差异、收入冲击后的消费反应来刻画。若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高收入家庭，则收入集中会抑制总消费。第二，预防性储蓄机制可通过医疗保险参与、

养老保险参与、家庭健康冲击、失业经历和主观风险预期来检验。第三，相对收入机制可通过社区收入排名、教育支出强度、住房负担和主观社会地位来识别。

表 2 给出了可用于后续实证分析的主要变量。需要说明的是，变量构造并非越复杂越好。若收入不平等指标、相对收入指标和财富指标高度相关，模型中同时放入可能引发多重共线性。因此，经验分析可先建立基准模型，再逐步加入机制变量和交互项，以观察核心系数的变化。

表 2 主要变量构造与经济含义

变量类别	构造方式	经济含义
消费规模	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家庭消费率	衡量消费扩容水平与消费倾向
消费结构	八类消费预算份额，或基本型、发展型、享受型消费份额	衡量消费升级与支出排序
收入不平等	地区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收入分位差	衡量家庭所处收入分配环境
相对收入	家庭收入分位数、相对地区中位收入比值	衡量社会比较和收入位置
流动性约束	是否被拒贷、是否缺乏金融资产、债务收入比	衡量消费能力受限程度
风险保障	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健康冲击、失业经历	衡量预防性储蓄动机
公共服务	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社区服务可得性	衡量风险支出私人化程度

（五）基准模型设定

基准回归可设定为：

$$\ln C_{ipt} = \alpha + \beta Inequality_{pt} + \gamma X_{ipt} + \mu_p + \lambda_t + \varepsilon_{ipt}, \quad (3)$$

其中， C_{ipt} 表示第 p 地区家庭 i 在 t 年的消费支出， $Inequality_{pt}$ 表示地区收入不平等水平， X_{ipt} 为家庭控制变量， μ_p 和 λ_t 分别为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若 $\beta < 0$ ，说明收入不平等提高会抑制家庭消费规模。

消费结构模型可写为：

$$Share_{k,ipt} = \alpha_k + \beta_k Inequality_{pt} + \gamma_k X_{ipt} + \mu_p + \lambda_t + \varepsilon_{k,ipt}, \quad (4)$$

其中 $Share_{k,ipt}$ 表示第 k 类消费预算份额。若 β_k 在教育、医疗、交通通信和服务消费中显著不同，说明收入不平等不仅影响消费总量，也会改变消费结构。

为了刻画收入位置差异，可进一步加入交互项：

$$\ln C_{ipt} = \alpha + \beta Inequality_{pt} + \delta LowIncome_{ipt} + \theta Inequality_{pt} \times LowIncome_{ipt} + \gamma X_{ipt} + \mu_p + \lambda_t + \varepsilon_{ipt}. \quad (5)$$

其中 $LowIncome_{ipt}$ 为低收入家庭虚拟变量。若 $\theta < 0$ ，说明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家庭消费的抑制更强；若 θ 不显著而 $\beta < 0$ ，则可能表明收入不平等主要通过地区整体预期或公共服务环境影响消费。

（六）QUAIDS 扩展模型思路

若进一步估计不同消费类别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可采用 QUAIDS 模型。其预算份额方程可表示为：

$$w_i = \alpha_i + \sum_j \gamma_{ij} \ln p_j + \beta_i \ln \left(\frac{x}{a(p)} \right) + \frac{\lambda_i}{b(p)} \left[\ln \left(\frac{x}{a(p)} \right) \right]^2 + \eta_i Z + \varepsilon_i, \quad (6)$$

其中 w_i 为第 i 类消费预算份额， p_j 为第 j 类商品价格， x 为家庭总消费支出， $a(p)$ 和 $b(p)$ 为价格指数函数， Z 为家庭特征和收入不平等指标。与线性 AIDS 模型相比，QUAIDS 模型允许消费预算份额随收入呈现非线性变化，更适合解释中国家庭在跨越基本消费阶段后出现的服务消费扩张和教育医疗支出分化。

在本文主题下，可将收入不平等指标嵌入 Z ，也可将其与总消费支出项交互。前者检验收入差距对某类消费预算份额的直接影响，后者检验收入差距是否改变恩格尔曲线形状。例如，收入不平等可能使低收入家庭在收入增长时优先补充食品和居住支出，而高收入家庭则更多增加文化娱乐和健康服务。若忽略这种非线性差异，容易低估收入分配对消费升级的制约作用。

QUAIDS 模型还需要满足加总性、齐次性和对称性约束。加总性要求各类消费预算份额之和为 1；齐次性要求价格和总支出同比例变化时需求结构不变；对称性来自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实际估计时，可删除一个消费类别方程，通过似不相关回归或极大似然方法估计，再利用约束恢复被删除方程参数。

六、经验分析、异质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一）消费规模效应的预期结果

按照前文理论，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消费规模的基准影响应为负。其经济含义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区收入差距越大，居民消费扩张越弱。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所有家庭消费都会下降，而是说明在收入分配更不均衡的地区，低收入家庭购买力不

足、高收入家庭消费边际递减和中等收入家庭预防性储蓄增强共同压低了平均消费水平。

若将样本按照收入分组，预期低收入组和中等偏下收入组的负向系数更大。这些家庭更容易受到流动性约束、就业不稳定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影响，收入差距扩大时消费支出首先被压缩。高收入组的总消费水平较高，受地区不平等的直接约束较弱，但其消费增量可能更多流向境外消费、高端服务和金融资产，未必充分转化为本地一般消费需求。

从城乡维度看，农村家庭对收入不平等的反应可能更复杂。一方面，农村家庭收入水平较低，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收入差距扩大容易抑制基本消费和耐用品消费；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和自给性消费可能缓冲部分市场消费波动。城镇家庭则更依赖市场化服务，教育、住房和医疗竞争更明显，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可能更强。

（二）消费结构效应的预期结果

消费结构方面，收入不平等可能降低食品和衣着等基本消费份额，也可能提高其份额，方向取决于家庭收入层次。对低收入家庭而言，收入差距扩大伴随收入增长不足，食品等必要支出占比可能被动上升；对较高收入家庭而言，食品占比继续下降，服务消费占比上升。因此，在全样本中，基本消费份额的系数可能不稳定，需要结合分组回归解释。

发展型消费的结果更值得关注。教育文化支出可能出现“倒 U 型”特征：在中低收入阶段，家庭为弥补阶层差距而提高教育支出占比；但在低收入家庭中，预算约束可能使教育支出反而下降。医疗保健支出也具有双重含义：若收入不平等加重健康风险和心理压力，医疗支出可能上升；但若低收入家庭支付能力不足，医疗消费可能被压缩，形成隐性健康需求。

服务消费通常对收入和预期更敏感。收入不平等扩大时，中低收入家庭会减少旅游、文娱、家政、养老照护和数字付费服务等可选支出；高收入家庭虽然增加高端服务消费，但群体规模有限，难以弥补大众服务消费不足。因此，收入不平等对服务消费份额的影响很可能为负，且在中等收入家庭中表现最明显。

（三）机制检验一：边际消费倾向差异

边际消费倾向机制可通过收入冲击或转移支付冲击来识别。若某些家庭获得工资增长、补贴或转移支付，可观察新增收入中有多少转化为消费。理论上，低收入家庭由于消费缺口较大，新增收入会更快用于食品、衣着、耐用品更新和子女教育；高收入家庭的新增收入则更可能用于储蓄、投资或偿还债务。

在模型中，可将家庭按收入分位划分为五组，分别估计收入对消费的弹性。如果最

表 3 收入不平等对不同消费类别的预期影响

消费类别	预期方向	解释逻辑
食品烟酒	不确定	低收入家庭占比可能上升，高收入家庭占比下降
衣着	弱负向	可替代性较强，收入预期下降时容易压缩
居住	正向或不显著	住房支出受制度和区位影响，刚性较强
交通通信	负向	耐用品、出行和通信升级依赖稳定收入预期
教育文化娱乐	分化明显	教育支出具有追赶性，文娱支出更易被挤出
医疗保健	不确定	既可能因风险上升而增加，也可能因支付约束下降
生活用品及服务	负向	家庭设备、家政和改善型服务容易延迟消费

低收入组和第二收入组的弹性明显高于最高收入组，则说明收入分配向中低收入家庭倾斜能够产生更强消费扩容效应。进一步地，可考察不同消费类别的边际消费倾向：低收入家庭新增收入主要流向基本消费和耐用品，中等收入家庭更可能流向教育、交通通信和服务消费，高收入家庭则更多流向高端服务和资产配置。

这一机制也能解释为什么单纯扩大高收入群体消费不能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路径。高收入消费虽然单价高，但边际扩张空间有限，且部分消费可能外溢到进口商品或境外服务。相比之下，中低收入家庭消费需求更广泛、更本土化，对就业吸纳和服务业扩张具有更强乘数效应。

（四）机制检验二：流动性约束与债务压力

流动性约束是收入不平等抑制消费的重要中介变量。家庭收入水平低并不意味着消费需求低，很多情况下是因为缺乏金融缓冲和可得信贷，潜在需求无法转化为现实支出。可用金融资产不足、是否有银行贷款、是否被拒贷、债务收入比和是否拖欠债务等变量刻画流动性约束。

若收入不平等系数在加入流动性约束变量后明显变小，说明收入差距通过信贷约束渠道影响消费。特别是在耐用品、教育培训、医疗服务和住房相关消费中，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可能更强。许多家庭并非不愿意进行耐用品更新或人力资本投资，而是担心未来收入不稳定、借贷成本高或缺乏抵押品，最终选择推迟消费。

债务压力还会改变消费结构。适度消费信贷可以平滑支出，但过高债务会挤出日常消费。对于背负住房贷款的中等收入家庭，收入不平等扩大可能加重房价和教育竞争预期，使其增加储蓄或提前还贷，从而减少文娱、旅游和服务消费。因而，在分析消费需求时，需要区分“信贷可得性不足”和“债务负担过重”两类不同约束。

（五）机制检验三：风险预期与公共服务

预防性储蓄机制可以通过健康冲击、就业风险、社会保险参与和公共服务可得性检验。若家庭成员发生重大疾病、户主失业或养老保障不足，家庭会倾向于减少可选消费并提高储蓄。收入不平等越高，家庭对未来风险的感知越强，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更担心一次冲击导致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公共服务可以降低风险支出私人化程度。教育、医疗、养老和托育等公共服务越充分，家庭越不需要依靠高额私人支出来获得基本保障。例如，优质义务教育供给能够降低家庭教育焦虑，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能够减少因病致贫风险，普惠托育和养老服务能够降低家庭照护成本。这些制度安排能够直接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在实证模型中，可加入收入不平等与社会保障变量的交互项。若交互项为正，说明社会保障能够缓冲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的负向影响。也可按照公共服务水平高低分组，比较收入不平等系数差异。预期在公共服务水平较高地区，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的抑制效应较弱；在公共服务薄弱地区，家庭更依赖自我储蓄，消费需求更容易不足。

（六）异质性分析：地区、生命周期与财富水平

地区异质性是中国消费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维度。东部地区收入水平较高、服务供给更丰富，但住房和教育竞争也更激烈；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较低，基本消费和耐用品更新仍有较大空间；东北地区人口老龄化和产业转型压力较大，消费预期可能更谨慎。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可能并不相同，需要结合经济发展阶段和公共服务供给解释。

生命周期异质性同样重要。年轻家庭面临住房、婚育和子女教育压力，收入差距扩大时更容易压缩文娱和服务消费；中年家庭承担赡养和教育双重责任，预防性储蓄动机更强；老年家庭的消费结构更偏向医疗保健和基本生活服务，收入不平等对其影响主要通过养老金、医疗保障和子女支持体现。若不区分生命周期，容易把不同家庭阶段的消费差异误判为收入差距效应。

财富水平与收入水平也需要区分。一些家庭当期收入不高但拥有住房和金融资产，消费能力并不弱；另一些家庭收入尚可但负债较重，消费倾向反而较低。因此，财富不平等可能比收入不平等更能解释耐用品和服务消费差异。实证中可按住房资产、金融资产和债务收入比分组，检验收入不平等在不同财富层次中的影响。

（七）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首先，消费不足可能反过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形成反向因果。其次，地区产业结构、房价、公共服务和人口流动等遗漏变量可能同时影响收入差距和消费需求。再次，收入和消费数据本身存在调

表 4 异质性分析的主要维度

分组维度	分组方式	重点观察内容
地区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城乡	服务消费、教育住房竞争、公共服务差异
收入	收入五分位、低收入与非低收入	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约束差异
生命周期	青年、中年、老年；有无子女	教育、养老、住房支出压力
财富	有无住房、金融资产分位、债务收入比	财富缓冲和债务挤出效应
保障水平	医保、养老保险、商业保险参与情况	预防性储蓄与风险消费

查误差，尤其是高收入家庭和隐性收入可能被低估。

稳健性检验可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更换收入不平等指标，例如使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收入五等分倍数和相对收入排名。若结果方向一致，说明结论不依赖单一指标。第二，更换被解释变量，例如使用消费率、消费支出对数、非食品消费支出、服务消费支出等。第三，改变样本处理方式，例如剔除收入为负家庭、调整缩尾比例、区分城镇和农村样本。第四，加入更细地区固定效应或地区线性趋势，以控制不可观测地区差异。

内生性处理可考虑工具变量或滞后变量。收入不平等的滞后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反向因果，因为当前消费难以影响过去收入分配。工具变量可从历史产业结构、地形条件、早期教育资源差异或政策试点中寻找，但必须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若工具变量难以完全成立，也可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倾向得分匹配和分位数回归等方法进行补充。

此外，还可以进行安慰剂检验。若收入不平等主要通过消费能力和预期影响家庭支出，那么它不应显著影响与家庭消费决策关系较弱的变量；或者在不可能受到收入差距影响的虚拟结果变量上不应显著。安慰剂检验虽然不能完全证明因果关系，但能提高结果可信度。

（八）对经验结果的综合解释

综合理论和经验设计可以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判断：收入不平等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不是单一线性关系，而是由收入位置、风险保障、生命周期和公共服务共同调节。对于低收入家庭，主要约束是支付能力不足和流动性约束；对于中等收入家庭，主要约束是住房、教育、养老和医疗风险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对于高收入家庭，主要表现为边际

消费倾向递减和消费结构高端化。

因此，收入不平等并非只在“穷人少消费”这一层面影响内需。它还会改变社会整体消费生态：低收入家庭无法充分释放基本需求和耐用品需求，中等收入家庭因未来风险而谨慎消费，高收入家庭消费边际效应有限，公共服务不足又使教育、医疗和住房支出具有竞争性和防御性。最终结果是消费规模不足与消费结构扭曲并存。

这一判断对政策含义十分重要。若只采取短期消费券或单一降价促销，能够改善部分即期消费，却难以改变收入分配和风险预期。若只强调高端消费和新型消费，也可能忽视中低收入家庭的基础需求和服务消费潜力。更稳妥的路径是将收入分配改革、公共服务改善和消费供给优化结合起来，使居民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

七、情景推演与指标解释

（一）收入再分配的消费扩容效应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收入分配改善如何扩大消费需求，可以进行一个简化的情景推演。假设社会中存在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类家庭，其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 0.85、0.65 和 0.35。如果新增 100 元收入主要流向高收入家庭，则新增消费可能只有 35 元左右；如果通过就业改善、工资增长和转移支付使新增收入更多流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则同样 100 元收入可能带来 65 元至 85 元新增消费。这个简单例子说明，消费扩容不仅取决于收入总量，也取决于收入增量的分配结构。

在现实经济中，收入再分配的消费效应还会通过乘数机制进一步放大。低收入家庭增加食品、衣着、日用品和基本服务消费，会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物流和社区服务就业；中等收入家庭增加教育文化、旅游休闲、养老托育和数字服务消费，会推动服务业供给扩张；服务业就业增加又会提高更多劳动者收入，形成收入增长和消费扩张的循环。相比之下，若收入主要转化为金融资产或高端进口消费，对国内一般消费和就业的带动作用相对有限。

当然，收入再分配并不等同于简单平均化。共同富裕强调的是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改善分配结构，核心在于提高劳动报酬、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强公共服务保障和规范财富积累秩序。若再分配政策损害生产激励，可能不利于长期收入增长；若只强调效率而忽视分配，又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和社会流动压力上升。因此，需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形成动态平衡，使收入增长能够转化为更广泛、更稳定的消费能力。

（二）消费率、消费倾向与消费福利的区分

讨论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时，必须区分消费率、消费倾向和消费福利三个概念。消费率是宏观或家庭层面的消费支出与收入之比，常用于衡量消费对收入的吸收程度；消费倾向更强调家庭在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消费福利则关注消费是否改善生

活质量。三者相关但不能混同。

例如，某个低收入家庭因为疾病冲击而增加医疗支出，消费率可能上升，但消费福利并未改善；某个家庭因为房贷压力降低文娱和服务消费，消费率可能下降，但这并不代表其偏好更节俭，而是预算约束更强；某些高收入家庭消费率不高，但生活质量已经较高，新增收入更多用于资产配置。因此，评价消费需求不能只看消费率高低，还要看消费结构是否合理、消费是否具有选择性、家庭是否能够在风险冲击下保持基本生活质量。

从共同富裕视角看，理想的消费扩容应具有三个特征：第一，消费增长来自稳定收入增长，而不是过度负债；第二，消费结构从生存型支出逐步转向发展型和服务型支出，而不是被教育、医疗和住房压力被动挤占；第三，消费福利在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更加均衡，而不是只集中于少数高收入家庭。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扩大消费才不仅是短期需求政策，也是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流动的长期政策。

（三）消费结构升级的阶段性特征

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并不是所有家庭同步发生的过程，而具有明显阶段性。低收入家庭首先追求基本生活保障，收入提高后会改善食品质量、衣着品质和居住条件；中等收入家庭在基本消费得到满足后，更关注子女教育、健康管理、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和家庭设备更新；高收入家庭则更多配置高端服务、个性化消费和资产型支出。收入不平等扩大时，不同家庭停留在不同消费阶段，社会整体消费升级速度会被拉慢。

这一阶段性可以用“消费阶梯”理解。第一阶梯是生存型消费，强调吃穿住用；第二阶梯是便利型消费，强调交通、通信和耐用品更新；第三阶梯是发展型消费，强调教育、健康和技能；第四阶梯是享受型消费，强调文化、旅游、休闲、养老和个性化服务。收入不平等会使低收入家庭难以跨过第一和第二阶梯，中等收入家庭在第三阶梯面临较大竞争压力，高收入家庭则率先进入第四阶梯。由此形成的消费分层，会降低服务业规模化发展和消费市场统一性。

政策意义在于，促进消费升级不能只面向已经具备高消费能力的人群，还要帮助更多家庭跨越消费阶梯。对于低收入家庭，重点是提高收入和降低基本生活成本；对于中等收入家庭，重点是降低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风险；对于高收入家庭，重点是优化高品质供给、规范市场秩序和引导本土服务消费。不同阶层的政策重点不同，但共同目标都是让消费升级建立在更均衡的收入分配基础之上。

（四）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新型消费差异

数字经济发展正在改变居民消费方式。网络购物、即时配送、在线教育、数字文娱、远程医疗和平台服务降低了部分消费门槛，使许多家庭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更丰富的

商品和服务。但数字消费并不会自动消除收入不平等，反而可能在设备、技能、时间和支付能力方面形成新的差距。

低收入家庭虽然也能使用平台购物和线上娱乐，但其数字消费更多集中在低价商品和基础服务；中等收入家庭更可能购买在线教育、会员服务、智能设备和品质电商；高收入家庭则进一步扩展到高端健康管理、定制旅游和智能家居。若数字基础设施、物流体系和数字技能培训不足，农村和低收入群体可能无法充分分享新型消费红利。

因此，新型消费政策应避免只强调技术场景，而要关注收入能力和公共服务配套。一方面，要完善县域商业体系、冷链物流和数字支付环境，使农村家庭能够更便利地参与市场消费；另一方面，要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平台劳动者保障和数据安全治理，避免数字消费扩张建立在低质量供给和不稳定就业之上。数字经济只有与收入增长和公共服务改善结合，才能真正成为消费扩容的普惠力量。

（五）地方政策评估的指标体系

地方政府在推动消费扩容时，常常关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旅游收入和汽车家电销售额等指标。这些指标能够反映市场活跃度，但不足以揭示收入不平等对消费需求的深层影响。若要从共同富裕视角评估消费政策，还应建立更完整的指标体系。

第一类指标是收入与分配指标，包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占比、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和地区收入差距。第二类指标是消费能力指标，包括居民消费率、非食品消费占比、服务消费占比、耐用品更新率和低收入家庭消费增长率。第三类指标是风险保障指标，包括医保报销水平、养老保险覆盖率、普惠托育供给、保障性住房供给和家庭债务压力。第四类指标是消费福利指标，包括居民消费满意度、公共服务可及性、消费纠纷处理效率和城乡消费便利度。

通过这些指标，可以更准确判断消费增长是否具有普惠性和可持续性。如果某地消费总额增长主要来自高端商业综合体和少数高收入群体消费，而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没有提高，消费扩容的社会基础就不稳；如果服务消费增长伴随公共服务改善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则说明消费升级更具可持续性。

（六）本文框架的适用边界

本文强调收入不平等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收入差距都会降低消费。合理的收入差距能够反映劳动贡献、技能差异和创新激励，对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具有积极作用。问题在于，当收入差距过大并与机会不平等、公共服务不均衡和财富固化叠加时，它会削弱居民消费能力和未来预期，进而抑制内需。

此外，消费需求不足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收入不平等。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房地产周期、国际环境、技术变化和消费偏好转变都会影响消费。收入分配只是其中一条重

要线索。本文的意义在于说明，若忽视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因素，许多消费刺激政策只能取得短期效果，难以形成长期内需动力。

因此，后续研究应在更细数据基础上识别不同机制的相对重要性。例如，在房价高企地区，住房负担可能是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在老龄化地区，养老和医疗风险可能更关键；在青年就业压力较大的地区，收入预期和就业稳定性更值得关注。只有将收入不平等与具体地区、具体群体和具体消费类别结合起来，政策设计才会更精准。

八、政策含义：以收入分配改革释放消费潜力

（一）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收入分配改革的首要方向，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业稳定性和工资性收入增长决定了多数家庭的消费能力。应通过提高技能培训质量、完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规范平台劳动用工、支持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等方式，增强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韧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是单纯提高收入门槛，而是形成稳定职业、稳定预期和稳定消费能力。

（二）完善再分配制度，提升转移支付的消费效应

由于中低收入家庭边际消费倾向较高，针对低收入群体、育儿家庭、失业家庭和老年家庭的转移支付具有更强消费乘数。财政政策应从普惠式短期刺激转向精准稳定支持，增强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协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社会救助标准动态调整和低收入家庭消费券等政策，若能与就业服务、医疗保障和教育支持结合，将更有效地转化为真实消费需求。

（三）降低家庭风险支出，稳定消费预期

预防性储蓄高企的重要原因是家庭承担过多不确定性。要释放消费需求，需要继续提高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能力，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和养老服务体系，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降低家庭在医疗、养老和住房方面的极端风险。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只是福利政策，也是扩大内需的基础制度。风险保障越充分，家庭越愿意将收入用于当期消费和品质升级。

（四）优化消费供给，避免结构性挤出

收入不平等导致的消费结构扭曲，部分来自优质供给不足和公共资源竞争。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若过度市场化或区域差异过大，家庭就会把大量支出用于追赶性竞争，挤出文旅、养老、家政和文化服务消费。政策上应增加普惠托育、优质义务教育、基层医疗和社区养老供给，使发展型支出回归公共服务属性，同时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和

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扩大服务消费可得性。

九、结论

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本文在借鉴需求系统和边际消费倾向异质性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收入不平等会通过收入集中、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和相对收入竞争等渠道抑制居民消费扩张，并对消费结构产生分层影响。基本消费受影响较弱，发展型消费和服务消费更容易受到收入差距、风险预期和公共服务差异的制约。

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并非两个彼此独立的政策目标。共同富裕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为消费扩容提供稳定制度基础；消费扩容又能通过就业、服务业发展和生活品质提升反过来增强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基于 CFPS、CHFS 或住户调查微观数据，使用 QUAIDS、分位数回归和动态面板模型估计收入不平等对不同消费类别的弹性差异，从而为更精准的收入分配和消费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参考文献

- [1] 朱国林, 范剑勇, 严燕. 中国的消费不振与收入分配: 理论和数据 [J]. 经济研究, 2002 (5): 72-80.
- [2] LOU F, LI X. The reasons for the declining Chinese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J].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2011, 6 (3): 432-448.
- [3] 陈建宝, 李坤明. 收入分配、人口结构与消费结构: 理论与实证研究 [J]. 上海经济研究, 2013, 25 (04): 74-87.
- [4] 胡日东, 钱明辉, 郑永冰.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基于 LA/AIDS 拓展模型的实证分析 [J]. 财经研究, 2014, 40 (05): 75-87.
- [5] 唐琦, 夏庆杰, 李实.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分析: 1995-2013[J]. 经济研究, 2018, 53 (02): 35-49.
- [6] 王俏, 聂力. 基于非参数面板计量模型的我国消费者消费行为特点研究 [J]. 数量经济研究, 2019, 10 (03): 140-154.
- [7] 李涛, 胡青芯, 冉光和. 基础设施投资与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研究 [J]. 经济学家, 2020 (11): 93-106.
- [8] DEATON A, MUELLBAUER J. 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 (3): 312-326.

- [9] BANKS J, BLUNDELL R, LEWBEL A. Quadratic Engel curves and consumer demand[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7, 79 (4): 527–539.
- [10] BARRO R J.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0, 5 (1): 5–32.
- [11] CASTELLÓ-CLIMENT A.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dvanced economi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10, 8 (3): 293–321.
- [12] JAPPELLI T, PISTAFERRI L. Fiscal policy and MPC heterogeneity[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4, 6 (4): 107–136.
- [13] CARROLL C D, SLACALEK J, TOKUOKA K, WHITE M 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the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J]. *Quantitative Economics*, 2017, 8 (3): 977–1020.
- [14] BILBIIE F O, KÄNZIG D R, SURICO P. Capital and income inequality: An aggregate-demand complementarity[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21, 126: 154–169.
- [15] 国家统计局. 2024 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 [R/OL]. 2025-01-17.
- [16]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项目介绍与用户手册 [R/OL]. 2020.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Demand
and the Expansion Path Under Common Prosperity

YANG Yinwei

Abstract: China's household income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yet the recovery of consumption demand still depends on income expectations, risk protection and distributional structure. Drawing on the logic of demand-system analysis and heterogeneous marginal propensities to consume, this paper buil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linking income inequality with consumption scale,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household expectations. It argues that income inequality depresses aggregate consumption through income concentration, liquidity constraints, precautionary saving and relative-income competition. The effect is weaker for basic consumption but stronger for education, health care,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service consumption. Therefore,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requires more than short-term subsidies. It calls for higher labor compensation, better redistribution, stronger social protection and more equal public services, so that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low- and middle-income households can be released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income inequality; consumption dem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